

二十世纪中国 通史编纂研究

◆ 赵梅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 通史编纂研究

◆ 赵梅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赵梅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5004-6108-1

I. 二… II. 赵… III. 中国—通史—历史编纂学—研究—20 世纪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2918 号

选题策划 黄燕生
责任编辑 骆珊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瞿林东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可能使许多读者都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是，不少读者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有关中国通史的著作，甚至下工夫研读过某种中国通史；“陌生”的是，20 世纪的百年中，史学家们撰写中国通史的历史过程、整体状况怎样？其中有些什么重要的问题值得研究？研究这些问题对增强我们的历史意识、民族精神有什么作用，对中国史学发展有什么意义？等等。本书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其突出的创新之处。

本书是赵梅春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现经作者进一步修订，予以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作者向我索序，而我也有些想法可乘此机会简要地说说，所以也就欣然答应了作者的要求。

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的传统之一。已佚的《世本》，或许是中国通史的雏形。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国通史的深厚基础。而中国史学上明确署为“通史”者，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作的南朝梁武帝时史官所撰《通史》，断限“起三皇，讫梁”。唐代史家对撰写通史有很高的热情，并撰写出多种体裁的通史，如《统载》、

《通历》、《通典》、《通选》等。这种现象，反映了历史撰述的一大转折，一度引起了我的兴趣，并曾为此撰写了《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从传世的历史著作来看，两宋史家所撰《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志》有很大的影响。元初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是以“文献”为主要内容的通史，亦为传世名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史家很重视总结通史撰述的得失。刘知幾《史通·六家》中的“史记家”所论，郑樵《通志·总序》所论，都涉及对通史撰述的总结。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家章学诚对中国史学上通史撰述的传统与成就，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指出：“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为《通史》一篇，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潏《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文史通义·释通》）这是对通史撰述的更加深入的总结。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由于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先后传入中国，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史学家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兴起了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的热潮。从“新史学”一派的史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方面都各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而奋斗。二是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

和明清档案材料的利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从而不断焕发史学家们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的经久不衰的巨大热忱。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又再度推动了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前者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一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其特点和规律；后者是在对历史研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把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时期的中国通史撰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供大专院校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二是供社会公众阅读的通俗读物，三是具有新的体系的研究性著作。总的说来，唯物史观的指导，新材料的发现和使用，史学家的认识水平的提高等几个因素，使这一时期的中国通史撰述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成为中国通史撰述最具活力的时期。

从20世纪中国史学上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思想来看，有几篇文献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一是章太炎先生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馥书·哀清史》附录，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34页）；二是范文澜先生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见《范文澜文集》第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0页），此文写于1954年，1963年改定；三是翦伯赞先生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4页），此文写于1963年；四是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7页），此文写于1978年，是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见解和结构上都有新意。以上四文各有特点：章文虽只是一个构想，但却显示出关于中国通史的宏大规模。范、翦二文，是总结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通史撰写中提出的重大

理论问题，以及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白文是就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作了全面的概括性的论述。这几篇文章对于今天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理论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而连续不断，丰富多彩而博大精深。20 世纪百年中，从梁启超先生 1901 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到 1999 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 12 卷本、22 册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几代史学家从不间断地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写出了百余部的中国通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幅壮丽的长卷，其中凝聚着史学家的心血、思想和智慧，令人赞叹，令人钦敬！

20 世纪行将结束的前夕，1999 年 4 月，当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致信白寿彝教授，表示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信中写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森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见《史学研究》1999 年第 3 期）这些话，既中肯地指出了《中国通史》的价值，又深刻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这封信写于 1999 年 4 月 26 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家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的精辟的总结。

赵梅春博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下，撰写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研究和撰写的艰难，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宏富、资料的繁重，更在于脉络的清理、问题的把握、认识的提炼，以及论文的结构和表述等等。短短的三年时间，要撰写这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既要有勇气，又要实事求是。所谓勇气，就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作为后学有责任对前辈们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业绩进行总结。果如此，则勇气于是乎生焉。所谓实事求是，就是把这一研究视为一个学习的过程和初步探索的过程。学术上，凡较大的课题，总是一步一步地展开。没有起步，便不会有行程。基于这一认识，赵梅春博士作出了这一有意义的选择。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想就它的内容和思想讲一点我的看法。

第一，关于作者研究的方法和本书的结构。对于这样一个繁难的研究对象，作者采用了纵向与横向结合、经验与问题相映衬的研究方法。纵向与横向结合，就是纵向梳理脉络，即第一章讲“历程”，横向概括要点，即二、三、四章分别讲历史观、编纂内容和编纂形式。经验与问题相映衬，即作者对编纂中国通史中的一家之言与群体智慧之互补的关系及其经验作了分析，此即第五章论述之内容；而作者在全书“后论”提出了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这是给自己留下了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空间，也是向史学界提出的一个问题，经验和问题相映衬所形成的张力，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继续深入下去。上述研究方法及其所形成的本书的结构，反映了作者在这方面作了艰苦的探索，但却给读者提供了走近本书的“捷径”，这或许也是本书一个成功所在。

第二，作者的撰述旨趣明确而始终如一地贯彻于全书，概括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历程：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

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形式，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我想，细心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绎出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如作者在第二章“历史观的变化与中国通史编纂”中，分析了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如何影响到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使这一认识在中国通史著作中反映出来，并突出地强调了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的重要。又如在第三章“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变化”中，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不断丰富”放在一个重要位置加以论述，这是揭示了中国通史著作在内容上的重大变化。再如，作者在第四章“中国通史编纂的多样性表现形式”中，强调了形式多样和民族特色的重要性。所有这些，表明作者在众多的研究对象中，能够把握那些应当予以肯定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在纷杂复杂的研究对象中，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

第三，关于本书“后论”中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这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理论勇气，而且也表明了作者考虑到提出这一问题的历史依据和未来需要。所谓历史依据，就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所积累的成果与经验；所谓未来需要，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中国通史的编纂还将继续下去。作为一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有这样自觉的意识和责任，是难能可贵的。对此，作者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的问题，即历史的部分，理论的部分，方法的部分。一方面是对前人的认识与撰述的概括，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些见解是值得关注的。如关于历史的部分，即所谓“中国通史编纂史述略”，我以为这是很有必要的，作为第一步，是否可以考虑先编写一部“一百种中国通史著作提要”，平均每种写三四千字，全书三四十万字，把从古到今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一一加以评介。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对专业研究者来说，也有参考价值。又如关于理论部分，即“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因

为写出有世界历史背景的中国通史，有助于建立起一种更全面更合理的中国历史观。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以中国历史为坐标，在相应的历史阶段中，适当地概括与此同时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对有的地区或国家的历史面貌略作勾勒；二是以中国人的眼光和用语来作以上的概括和描述，使之与中国史的表述相协调。当然，这就需要中国史研究者和外国史研究者的密切合作。再如在方法部分，作者讲到了学术组织工作形式和运作，这是大型学术撰述必须采用的一条途径，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以及其他一些学术工程，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和借鉴这些经验，对今后实施中国通史编纂和相关的学术工程，是有帮助的。

20 世纪的中国通史编纂及其成就，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方面，本书对其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多有创获，但因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研究任务十分繁重，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广阔的空间。本书的价值所在，就是它在这方面迈出了艰难而有意义的一步。

是为序。

2007 年 2 月 6 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瞿林东(1)
绪 言	(1)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	(5)
第一节 新型中国通史的创立	(6)
一 20 世纪以前通史编纂述略	(6)
二 传统类型向近代类型的转变	(8)
三 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的发展	(20)
第二节 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的深入	(41)
一 唯物史观的普及与中国通史教学体系的 改造	(41)
二 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与中国通史理论的 建设	(45)
三 中国历史认识的深化	(55)
第三节 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的进一步发展	(70)
一 中国通史编纂的新发展	(71)
二 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成果	(74)
三 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的趋势	(81)

第四节	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与 社会价值	(86)
第二章	历史观的变化与中国通史编纂	(100)
第一节	进化史观与中国通史撰述的变革	(101)
一	进化史观与国人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	(101)
二	关于中国历史进程	(108)
三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	(112)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中国通史新体系的建立	(122)
一	唯物史观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	(122)
二	范、吕、葛所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的新体系	(126)
第三节	历史理论的创新与具有民族特色的 中国通史编纂体系	(134)
一	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重新认识	(134)
二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通史编纂体系的探索	(138)
第三章	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变化	(148)
第一节	中国通史内容的不断充实	(149)
一	史前史的逐渐充实	(149)
二	新史料的发现对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 积极影响	(170)
三	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历史	(177)
第二节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不断丰富	(182)
一	对民族史的重视	(182)
二	写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面貌	(185)
三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撰述的新发展	(189)
第三节	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重心的变化	(195)
一	以“文化史”为主要内容	(196)

二	关注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活动	(201)
三	重视典章制度和人物活动的记述	(205)
四	突出中华文明的成就	(208)
第四章	中国通史编纂的多样性表现形式	(211)
第一节	多样性的体裁和体例	(211)
一	中国通史编纂新体裁的出现	(212)
二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	(224)
三	其他的中国通史体裁	(231)
四	中国通史编纂的体例	(234)
第二节	文字表述的多种风格	(236)
一	文言文与语体文	(236)
二	历史文学上的要求	(239)
三	丰富多彩的文字表述形式	(241)
第三节	中国通史编纂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创新	(248)
一	多样性表现形式的意义	(248)
二	表现形式的继承与创新	(252)
第五章	一家之言与群体智慧	(255)
第一节	一家之言与个人写史	(256)
一	自得之学与中国通史著作的撰述	(256)
二	各具特色的中国通史著作	(260)
第二节	集众修史与群体智慧	(272)
一	集众修史的必要性	(272)
二	“积一代之智慧”	(276)
后论: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	(292)	
一	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必要性	(292)

二 关于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	(295)
(一) 中国通史编纂史述略	(295)
(二) 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理论	(297)
(三) 中国通史编纂的主要方法	(305)
(四) 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310)
 附表:20 世纪中国通史著作一览表	 (315)
 主要参考文献	 (326)
 后记	 (331)

绪 言

20 世纪是中国史学变革和创新的世纪。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专题、专史、断代史、通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中，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最引人注目。从 1900 年章太炎提出撰写新型中国通史著作、1901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到 1999 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全部完成，百年中，出版了 130 余部中国通史著作，众多的史学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凝聚着百年来中国史学家的心血。章太炎、梁启超、夏曾佑、刘师培、李泰棻、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钱穆、缪凤林、张荫麟、陈恭禄、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尚钺、郭沫若、蔡美彪、张舜徽、白寿彝等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为 20 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作出了贡献。梁启超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期望一部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使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焉”^①，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爱国热情。蔡美彪先生在十卷本《中国通史》完成之时，曾赋诗一首：“十卷书成鬓如丝，雪夜寒灯伴影时。反观旧作惭多弊，每读新篇愧少知。千秋青史情无限，百岁生涯憾有期。夜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 页。本书所引证的书籍的版本、论文的刊名及刊期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

读常嗟人易老，且盼金鸡报晓迟。”^①千秋青史情无限，凝聚着从范文澜到蔡美彪两代史学工作者庄严的历史责任感。白寿彝先生曾指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跟我们的国家地位不相称。”^②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时，他无比欣慰地说：“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③由衷地表现出一种完成历史使命的自豪感。这些是百年来史学家对理想的中国通史著作不倦追求的生动写照。可以说，撰写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魂牵梦萦之事，即便是以疑古辨伪著称的顾颉刚、以历史考证享誉史坛的陈寅恪，其心中所惦记的一件大事也是撰写一部中国通史。^④尽管这些中国通史著作在历史观方面、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各不相同，其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也各有差别，却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执著而又艰难的探索，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史学所达到的总体水平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总的估量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

① 许殿才：《千秋青史情无限——蔡美彪先生谈十卷本〈中国通史〉》，《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② 白寿彝：《古籍整理和通史编纂》，《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页。

③ 《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④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绪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指出：“据俞大维回忆，早年寅恪先生也曾有志编著通史”。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说：“萦绕于父亲胸中的一项大事业，是编成一部中国通史。”

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① 这说明，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所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

白寿彝先生十分重视史学遗产的总结。他指出总结史学遗产，一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二是可以逐步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是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②。20 世纪的中国通史编纂所积累的辉煌成就，既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代中国通史编纂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发掘和总结，以推动当代中国通史编纂的发展。通过总结 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遗产，一则可以了解前人在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述方面已有的成就、提出的问题以及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出新的认识；二则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明确当代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的起点，提高撰述水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21 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经营思考和艰难探索的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③。基于此，本书在前人和当代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对 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20 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成就博大丰厚，本书的总结还只能说是初步的，有关 20 世纪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成就的深入研究，有待于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① 瞿林东：《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下）》，《历史教学》2000 年第 5 期。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第 462—463 页。

③ 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史林》2003 年第 6 期。